

## 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主旨的深化与发展

### ——兼评“文化断裂论”

沈淑瑜

**本文提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提倡的“民主”“科学”的内涵较第一阶段有了深化,也是民族救亡向前和向上的发展。从五四启蒙到五四政治运动,不是“民族主义淹没了文化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本身救亡目标的实践表现”;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航向,而是纠正了初始目标脱离实际的航向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超时’的盲从,而是民族救亡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选择”,可见“文化断裂论”是没有根据的。

自1915《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含两个发展阶段的统一的文化运动。中国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sup>①</sup>,其制约、规定了中国社会运动的一切方面,文化运动也必然打上它的烙印。五四前的文化运动,就其表现形态来说是启蒙运动,但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却是“民族救亡”。启蒙运动是“五四”政治运动的思想先导。巴黎和会骗局的揭穿,宣告了资产阶级文明不能引导中国走上“民族解放”之路,先进思想界的关注重心,立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成了中国“民族救亡”的旗帜。所以,“民族救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这一共识,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走向,它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于新文化运动的始终。

中国是以同西欧大不相同的方式进入近代的。中国社会的整个近代,面临的都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瓜分危机,民族的救亡图存,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昼夜焦虑,孜孜以求的主要课题。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说当今西方民族,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而中国则“腐败分子充塞社会”,若不自觉起而奋斗,那末中华民族将“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消灭”;真是振聋发聩,催人猛省。李大钊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用更为明确的语言,从历史和现状两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中国之待亡也久矣!”“甲午战终,日索辽东,为求牵制而‘引狼拒虎’,以至俄租旅大,法占广州,英据威海,德有胶州,自是‘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庚子之役,‘瓜分之机愈迫’,‘英之于西藏及长江流域’,‘俄之于外蒙伊犁’、‘日之于福建南满’,‘法之于滇、德之于鲁’或由战胜攻取,或由秘密缔约,或由清廷断送,或由列强协谋。辛亥革命后,用铁路作抵而‘大举借款’,列强在华之经济势力‘益密’,经纬参差,纤维若织,中国似‘自缚之春蚕’,列强如‘争食之饿虎’,各国对

我领土之兴味“益浓”。现今,日本乘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进兵山东,“问鼎神州,包举禹城”,又提亡华“凡十九条”(按:实为二十一条),“作瓜分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我举国父老兄弟姐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矣。民族危况,令人惊心。

民族危亡的根源何在?当时他们以为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不觉悟”。其表现:一是缺乏抵抗之决心与勇气。他们说吾国之衰因,不止一端,“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已铸为民族性”,人们但“求生命财产之安全”,对政治良否,国家命运,“绝不闻问”<sup>②</sup>。二是道德人格之堕落。如武人乱政,社会腐败,官吏贪墨等等,都是“亡国灭种之根源”,亦道德堕落之“铁证”<sup>③</sup>。三是民族文化之停滞与守旧。他们说,当今世界,“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反观中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比之西方,“无不相形见拙”,今天中国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秦两代而来”,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长此不能随世界进化以具进,那就会“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遭淘汰,人民将“纳之牛马黑暗沟中”<sup>④</sup>。四是纲常名教等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他们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sup>⑤</sup>。三纲之本意,在于维护“别尊卑明贵贱”<sup>⑥</sup>的封建等级秩序,一切言行,只能唯君、唯上、唯长,不敢稍有差异,当然不可能知大势、明责任,关心政治,抵抗强暴。因此,国民伦理道德观念“受束缚”是“不觉悟”的根本原因。故伦理的觉悟,是“吾人之最后的觉悟”<sup>⑦</sup>。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他们认定以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觉悟为救亡之方针。他们认为,为救亡,必须自强,欲自强,必须“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sup>⑧</sup>,但在目前,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sup>⑨</sup>,为此,得首先输入西洋式之“新信仰”,提高国民伦理的“觉悟”,以建立“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sup>⑩</sup>。

所谓“新信仰”,其一,是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立的民主——即所谓“平等人权”。根据民主的原则,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于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sup>⑪</sup>。共和立宪政治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的根本之条件”,若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那末“宪法乃一纸空文”,立宪政治之精神尽失,共和立宪,不过是“伪共和”和“伪立宪”,是“政治之装饰品”。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看来,平等人权,国民政治,对共和立宪政治具有决定意义。

所谓“新信仰”,其二,是与封建的个人崇拜、鬼神迷信、愚昧落后相对立的“科学”。当时所谓“科学”,一是反映自然界内在规律的知识体系,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二是指人类思维的逻辑方法,即“对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拆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的思想方法;三是包括“天赋人权说”、“天演进化论”在内的社会科学。他们指出,近世欧美各国,人们对任何事物,“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使“人间的思想行为,一尊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为之风息焉”,欧美各国所以“优越他族者”,赖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可是在中国士、农、工、商皆不懂科学,全凭祖传与想象,造成了迷信、愚昧与落后。他们认为,对那些无常识之思想,无根据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中国人要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应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⑫</sup>,否则,难以自强。

启蒙学者们为了贯彻自己的救亡方针,除正面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外,对服务于旧制度的旧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家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期激发人们的伦理觉悟。他们说,中国

要建新国家,立新信仰,那些与此信仰不相容之孔教<sup>⑧</sup>,尤其是儒者提倡的忠、孝、节、义,是“奴隶之道德”<sup>⑨</sup>，“民贼之巢穴”，“吃人的礼教”<sup>⑩</sup>。总之，中国的启蒙学者企图以猛烈的火力，将反共和致亡国的旧思想旧文化铲除干净，为建立共和政治扫清道路。

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地激励人们奋起，为民族救亡而抗争。他们说，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料其国之终必不亡”<sup>⑪</sup>；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之师资”，“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理”，否则，必致国家沦亡，身成“降虏”<sup>⑫</sup>。他们特别寄希望于青年，要他们做救国的先锋。中国的启蒙学者满怀信心要高撞“自由之钟”，使中华“睡狮”闻之震然而起。

## 二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这次失败，给知识精英们通过列强“援手”获取独立解放的幻想以毁灭性打击。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以人类为牺牲”，“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sup>⑬</sup>，不再相信“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能够救中国”<sup>⑭</sup>。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sup>⑮</sup>，宣告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同法兰西文明的决裂。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sup>⑯</sup>，将追寻真理的视线，转向了苏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开始传播，并以它为思想武器，“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于是，中国文化思想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对中国面临形势的认识上，他们既看到了现实的亡国危机，又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末路和中华民族的光明与希望。他们说，巴黎和会“倂我等于战败国德奥之列”<sup>⑰</sup>，是民族的奇耻大辱，“吾国存亡，千钧一发”<sup>⑱</sup>。但是形势也并非一团漆黑。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sup>⑲</sup>，“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这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也从中看到了曙光，找到了新路<sup>⑳</sup>，帝国主义“末日审判”就要到了<sup>㉑</sup>。

在对中国产生亡国危机根源的认识上，也与五四前大相径庭，改变了以前“由于国民不觉悟”的不正确认识。他们说，从国际上看，“现在还是强盗世界”，“还是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sup>㉒</sup>。巴黎和会的一切决定，全都是拿弱小民族的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sup>㉓</sup>。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产生亡国危机的国际根源。从国内看，陆曹章辈固然有罪，不过是造成罪恶的工具，根本的罪责还在卖国政府<sup>㉔</sup>。中国的强盗政府根据秘密外交，将中国人民生活的土地送给“强盗国家，以扩张它那强盗势力”<sup>㉕</sup>。因此，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是亡国危机的国内根源。

针对中国面临的形势，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直接行动”与“根本改造”的救亡方针，第一次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帝国主义。陈独秀号召学生、商人、劳工、军人起来采取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sup>㉖</sup>，李大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强盗世界”，实现“民族自决”<sup>㉗</sup>，并认为对中国的问题，不能搞点滴改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先将反动统治推翻，改变社会制度，然后“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了的希望”，如十月革命之于俄国然<sup>㉘</sup>。

为了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们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的奋斗目标。他们认为，第一，进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他们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社会进化的一定的轨道，中国也不“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封建得势，但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得势不过是一时的现象<sup>㉙</sup>；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公平合理，多数人可以获得

得幸福的社会制度,因为“一切生产机关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谋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sup>⑧</sup>。第三,资本主义共和政治救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说,共和政治对于中国来说,当前已无价值,“将来并无希望”,辛亥革命是空前盛举,但“太没有持续性”,不能解决救亡问题;在中国,除了由有觉悟的劳动者“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打破资本家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外,无任何办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侵略进而为政治侵略”;第四,“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sup>⑨</sup>。

贯彻“根本改造”的方针,必须依靠劳工阶级。他们认识到劳工阶级是变革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与伟大力量。陈独秀说,“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全是他们做出来的,所以做工的是社会的“台柱子”,靠了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sup>⑩</sup>。李大钊说,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劳工阶级将形成一种群众运动,这是一种伟大的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一切旧势力都会被劳工“雷霆万钧的力量所摧拉”<sup>⑪</sup>。

为了实现“根本改造”的方针,他们经反复辩论、比较,认为应以十月革命为榜样,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改造社会的行动指针。李大钊说,人民的解放,根本解决是“经济问题的解决”,但若不开展阶级斗争,那么,“经济解放将永远不能实现”<sup>⑫</sup>。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强力意义。他说,世界上最不平最可恶的事,是统治者用强权压迫劳动者过牛马生活,要扫除这种痛苦,只有使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否则,“再过一万年劳动者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蔡和森和毛泽东认为,人民“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要得政权,必须开展阶级斗争,建立“阶级专政”<sup>⑬</sup>。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被接受,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为救国而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接着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从文化宣传运动一变而为革命的实践运动,中国的救亡运动以崭新的姿态,轰轰烈烈向前发展。

### 三

以上考察,证明了民族救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阶段的主题,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救亡”主题,决定于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启蒙运动,但它与法兰西启蒙运动不同,它不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矛盾的简单反映。二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同封建势力的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如法国在革命前那样构成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启蒙的呐喊,虽也是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造舆论,启蒙学者虽也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愿为民主共和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但是,法兰西文明是作为救亡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而引进的,是图强,其目的主要地不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能达到国家强盛,任何制度都可采用),而是解决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求“适用生存于今世”,以免“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消灭”<sup>⑭</sup>。从1915年《敬告青年》,到1919年《〈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五四启蒙运动一以贯之的精神,都是民族的“图强以救之”,前文的宗旨是“适环境之争存”,后一文则是通过民主和科学,把中国从黑暗中救出。黑暗云者,在西欧是封建统治,在中国主要是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化启蒙何以只有四年暂短的历程就被社会主义运动所替代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主共和”没有“救亡”的功能。“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一个国家需要的程度”<sup>⑮</sup>。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

最杰出的部分,与其说他们是民主主义者,毋宁说他们主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少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的只是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当民主共和不再是救亡真理,“理性王国”不再是图强的效法楷模,启蒙运动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启蒙运动本应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独立人格不过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人格表现。在法兰西,文化启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中国的文化启蒙是中华民族的警世“晨钟”,缺乏经济基础的文化运动是难以持久的。

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运动,但它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不是“工业和商业太发达”<sup>⑧</sup>的结果,恰巧相反,它是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整个民族处于西方列强奴役之下,为救国需要而苦苦追寻的结果。“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sup>⑨</sup>。“天赋人权”的理论虽也诱人动听,但它在中国民族救亡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难有作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甚至没能帮助中国先进分子认清导致亡国危机的主要敌人,更谈不上找到摆脱危机的办法。反之,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指导人们认清了主要敌人,找到了理想的新制度和依靠力量,而且提供了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自然为中国先进分子所选中。当然,中国先进分子一经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终极目标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探索、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和直接目的,却在于“救亡图存”。此点,先进知识分子们曾反复说明。他们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将中国从“危难中救出”<sup>⑩</sup>,能“达到中国独立的目的”<sup>⑪</sup>。蔡和森说,如果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对“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是忘了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须知中国全国的生命早已“握于五大资本强国之手”,所以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也就是反帝救亡的斗争。

被救亡主题所制约的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

在第一阶段,中国先进分子为救亡而高高举起了“民主”的旗帜。所谓民主,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其含义,一是指“一种国家形式”,它是排斥异己、系统使用暴力的组织;二是“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sup>⑫</sup>。中国启蒙学者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引进法兰西文明的。当时他们为图强而渴望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但这种国家必须以“国民政治”为基础,所以他们倡导人权,鼓励人们争取不受外界限制地自由表达个人意志、参与和选择政治的平等权利。在法兰西文明里,“人民”是指资产阶级<sup>⑬</sup>。而陈独秀说是有“独立财产”<sup>⑭</sup>的“一般商民”<sup>⑮</sup>,李大钊说是“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sup>⑯</sup>,显然也都是指资产阶级。他们所追求的“共和政治”,无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法兰西文明引导西欧走向强盛,中国先进分子也是为提高国格而标扬民主。可是,历史给了这条道路以否定的答复。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还争取民主呢?当然是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sup>⑰</sup>。但是,民主的“主体”变了,这里的“人们”主要是指工农大众;“不受限制”地表达个人意志,不光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也冲破了资本主义的藩篱;人们“表达个人意志”的结果,成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就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文明代替法兰西文明,用反帝反封建斗争来提高“国民性”,用阶级论来取代进化论,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来替代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见,第二阶段的民主的实质改变了,不再是“资本压迫劳动”<sup>⑱</sup>,体现了“多数人的统治”。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就是这样理解民主的:民主“不是仅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点”,而是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的“全路程”,不单要求一个“没有君主的国体”,而是要求把“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扫除”,“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一步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所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的“一个过程”,它同民主是同一的,不是“两个东西”<sup>⑲</sup>。他

们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成是“民主主义的胜利”。<sup>⑧</sup>诚然,这已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了,但是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民主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无疑义的了。

第一阶段所提倡的科学,对反对封建迷信、个人崇拜、主观臆断、因循守旧,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启蒙学者所运用的思维逻辑方法,虽然能揭示思维规律,却不能保证思维的科学与真理性。他们推崇的“天演进化”论,将生物运动的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宣传了发展观,批判了停滞论,可以促人奋进,它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也符合形式逻辑。但是,在社会运动中,优者必定胜,应当胜,劣者必定败,应当败吗?弱者的肉必定也应当供强者食吗?显然,这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理论。中国先进分子长期误解了中华民族亡国危机的根源,批判的火力总是只对准自身,而忽略了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同时把人民看成弱者愚者,企图用“改造国民性”来求得中国的强大,几番努力,不见成效,最后只有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这就是用天演进化理论指导的结果。第二阶段情况就不同了:辩证逻辑与阶级论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认出西方帝国主义,是欲瓜分与灭亡中国的死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而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事物必胜;广大劳动者不是“弱者”“愚者”,而是撑住社会的“台柱子”,将来则是掌握政治的“治人”者。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图强以救亡,但图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依靠社会主义运动;一旦达到目的,不是去“食弱者”,而是努力创造条件,建立人类社会最合理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人民更幸福。所以,恩格斯说:“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sup>⑨</sup>。李大钊也说,从前讲天演进化,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应该牺牲弱者,以造成强者的优势地位,“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sup>⑩</sup>。

综上所述,救亡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启蒙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途径、方法和手段。从五四启蒙到五四政治运动,不是“民族主义淹没了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本身救亡目标的实践表现;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不是“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航向”,而是纠正了初始目标脱离实际的航向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超时”的盲从,而是民族救亡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既是第一阶段民主和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第一阶段“民族救亡”向前和向上的发展。可见,“文化断裂”论是没有根据的,它忽视了被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矛盾所制约的文化主题,脱离了“五四”时代中国的国情。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4、59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独秀文存》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独秀文存》

⑲⑳㉑㉒㉓㉔《独秀文存》

⑳《吃人的礼教》《新青年》六卷六号

㉑郑振铎:《现代社会改造运动》,《新生活》第一期

㉒李劫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

㉓瞿秋白:《中国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五四运动文选》426页

㉔《北京学生界宣言》,《时报》1919年5月6日

㉕《天津各界国民大会宣言》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李大钊文集》

㊱《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㊲《北京市民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

㊳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五四运动文选》459、500页

㊴李大钊《新纪元》《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㊵见《新民学会通讯集》第3集

㊶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10页㊸㊹《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选集》第257页

㊺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第162页

㊻《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

㊼转引自《民主的历史演变》,第123页。

㊽《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㊾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63页。